

元典文化丛书

纵横家书

《战国策》与中国文化

张彦修 著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纵横家书

《战国策》与中国文化

张彦修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元典文化丛书

纵横家书

ZONGHENG JIASHU

——《战国策》与中国文化

张彦修著

责任编辑 郑慧生

责任校对 张炎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33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精装 25.00元
平装 20.00元

ISBN 7-81041-511-5/K·222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

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义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惟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惟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传统文化,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传统文化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义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做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

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入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

自己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期,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纵横家与《战国策》	(1)
1. 雄厚久远的历史根基	(1)
(1) “行人之官”的历史足迹	(2)
(2) 纵横家在战国的崛起	(5)
(3) 纵横家的再认识	(7)
2. 纵横家的教科书《战国策》	(10)
(1) 《战国策》的成书与注释	(10)
(2) 《战国策》的性质及流传	(12)
(3) 地下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	(16)
二 《战国策》的思想体系	(20)
1. 智谋韬略 万事之本	(20)
2. 不拘一格的人才谋略	(23)

3. 以说为谋····· (29)
 - (1) 得情钓机 把握时势····· (30)
 - (2) 因情进说 能言善辩····· (34)
 4. 林林总总的长短纵横之术····· (39)
 - (1) 强化君权的驯臣之术····· (39)
 - (2) 内部政治斗争的制胜权术····· (46)
 - (3) 外交斗争的制胜之术····· (55)
 5. 长短纵横之术的基本原则····· (67)
 - (1) 谨守秘密 含而不露····· (68)
 - (2) 创造局面 力争主动····· (70)
 - (3) 以利益为轴心 相互利用 相互倾轧····· (72)
 - (4) 度势进退 随机应变····· (77)
 - (5) 为了成功 不择手段····· (79)
 6. 长短纵横之术的哲学基础····· (86)
 - (1) 转祸为福 因败为胜····· (87)
 - (2) 重直观 善比喻····· (90)
- 三 《战国策》的民本思想与士人精神····· (96)
1. 独具风骚的民本思想····· (96)
 - (1) 苟无民 何以有君····· (97)
 - (2) 无鬼神 不言天命····· (98)
 - (3) 富民 利民 安民····· (100)
 - (4) 贵士····· (106)
 2. 闪光的士人精神····· (109)
 - (1) 积极进取 建功立业····· (109)
 - (2) 强烈的忧患意识····· (115)

(3) 英勇无畏 敢于献身·····	(118)
四 纵横家的流变·····	(123)
1. 秦汉之际的纵横家·····	(123)
2. 秦汉以后纵横家的变种·····	(129)
3. 纵横家的学术转型·····	(134)
(1) 长短纵横之术的理论之作《鬼谷子》·····	(134)
(2) 纵横家的理论之作《鬼谷子》·····	(136)
(3) 《三十六计》长短纵横之术的转型·····	(144)
五 纵横家文化的承传·····	(159)
1. 专制制度与纵横家文化·····	(160)
(1) 专制制度的结构特点与长短纵横之术·····	(160)
(2) 专制政权对政治权术的运用·····	(163)
(3) 政治权术对专制政权的副效应·····	(176)
2. 纵横家与传统文化·····	(179)
(1) 纵横家文化与儒学·····	(179)
(2) 纵横家文化与道家·····	(185)
(3) 纵横家文化与法家·····	(190)
(4) 纵横家文化与文化人·····	(192)
3. 纵横家文化与传统处世哲学·····	(196)
(1) 长短纵横之术向处世哲学的扩散·····	(197)
(2) 充满智慧和权术的处世哲学·····	(202)
4. 纵横家文化酿成的《战国策》文学艺术·····	(208)
(1) 纵横家文化与《战国策》的文学艺术·····	(208)

(2) 《战国策》的文学艺术与纵横家文化的传播	(219)
附录一 《战国策》选译	(224)
东周策(224) 西周策(225) 秦策一(226)	
秦策三(243) 秦策五(256) 齐策三(259)	
齐策四(261) 齐策六(271) 楚策一(274)	
楚策四(279) 赵策一(280) 赵策二(284)	
赵策三(287) 赵策四(293) 魏策四(296)	
韩策二(297) 燕策一(301) 燕策三(304)	
宋卫策(314) 中山策(314)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16)

一 纵横家与《战国策》

1. 雄厚久远的历史根基

《七略·诸子略》说：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

《汉书·艺文志》说：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下诈谖而弃其信。

《隋书·经籍志》说：

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治。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

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残害忠信,覆邦乱家。

《七略》、《汉书》和《隋书》不仅认为纵横家起源于“王官之学”,而且还强调了行人之官,“遭变用权”、“权事制宜”、“明辩说,善辞令”等特征。

(1) “行人之官”的历史足迹

《周礼·秋官》中有“大行人”与“小行人”之官,“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负责王朝一切外事活动;“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负责外事活动中的具体事务。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的注释中说:“行人,通使之官。”指明行人就是肩负“通使”重任的外交官。把外交官称为“行人”是西周、春秋和战国的说法,在夏朝这种“通使”之官称为“道人”,在商则称为“吏”。

据有关材料,夏王朝中央政府是采用分封同姓或异姓部族方国的办法来进行统治的,分封的十二个同姓方国和一些异姓方国共同构成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这些方国与夏王朝中央政权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关系和经济上的纳贡关系,同姓者还有血缘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方国的分封关系,负责传达中央政府命令,处理相关事务的“道人”不能不经常往来穿梭于中央政府与方国之间。

商王朝实行“内服”和“外服”制度。“内服”是商王朝直接统辖的王畿地区,设立“殷正百辟”;“外服”是商王诸妻、诸子、

功臣以及臣服于商王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王畿之外的地区，外服封国的最高首领称为侯、甸、男、卫、邦伯，外服诸侯对商王朝中央政府承担有防边、随王出征、进贡和服役等义务。商王朝的“内服”、“外服”制度，决定了“吏”官的发达。根据甲骨卜辞，“吏”又分为“我吏”、“上吏”、“下吏”、“亚吏”、“东吏”等，其职掌类似于后来的“行人”。

武王伐纣，一举灭商，为建立和巩固西周政权，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先后分封71国，其中兄弟15人，同姓40人，投降臣服为封国者数百。受封后的诸侯成为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君，除了按规定向天子纳贡、朝觐、出兵助征伐以外，一切内政都由诸侯自理。西周的这种封邦建国的政治格局，使专掌“通使”之事的“行人之官”，在殷商“吏”职官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肩负着周天子、诸侯之君使命的专职外交官员。

历史步入春秋，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争、行成、会盟等史不绝书。据有关统计，春秋300余年间，各种外交活动约181次，其中盟81次，会56次，朝11次，赴4次，聘使问告29次。频繁的外交活动，使肩负外交重任的“通使”之官“行人”特别忙碌，仅一部《左传》就见“行人”踪迹23处。从《左传》有关“行人”的材料来看，春秋的“行人”之官熟知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谙练于外交仪程和礼节，或单独奉命出使，或陪同国君、重臣外出会盟、朝聘。在外交活动中他们有较强的主动权力，并表现出不凡的政治才干、善辩的口才与灵敏的头脑。由于春秋时期外交活动频繁且多为事关全局的重大事件，所以不少身居高位要职者也都从事外交活动，并涌现出一些名垂史册的著名外交家，他们虽然不是“行人”，都有高